

《耆旧续闻》作者非陈鹄考

许 勇

内容摘要:自明代以来,陈鹄一直被认为是南宋笔记《耆旧续闻》的作者,经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考证以后,广为学界所认同,当代学者大都沿着四库馆臣的思路,从笔记内容、笔记命名出发,考察作者的生平事迹,但收效甚微。然而对于《耆旧续闻》作者晚出这一现象,并没有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。笔者从这一现象出发,关注《耆旧续闻》的两种署名方式:“南阳陈鹄录正”、“陈鹄西塘撰”,并结合明代沈周《客座新闻》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署名“西塘陈鹄录正”,加以对比考证,认为陈鹄是明代人,并非《耆旧续闻》的作者,仅仅是一位抄录者。“西塘”、“南阳”都可能是陈鹄的自号。而在《耆旧续闻》的流通区域内,恰好有一位浙江籍进士陈鹄。进士陈鹄是否是抄录者陈鹄,由于资料所限,笔者不敢妄下雌黄,且备一说。

关键词:《耆旧续闻》 陈鹄 《客座新闻》 西塘 南阳

最早提及南宋笔记《耆旧续闻》作者为陈鹄的,是明万历十五年(1587)刊刻的《[万历]绍兴府志》,其记载云“宋陈鹄《耆旧续闻》”^①。这距《耆旧续闻》成书时间已二百多年。而其作者身份最终得到确定,是在《四库》本与鲍廷博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中。为何一本成书于南宋的笔记,一直到明代才出现了关于作者的记录?这种记录是否可靠?如果可靠,又有何依据?除此以外,后世对陈鹄生平的记载又从何而来?不同的署名方式是如何产生的?这些问题,都将是本论文需要面对,并试图解答的。

一、考察作者事迹的两条途径

对《耆旧续闻》有所研究的学者如钟克豪、郑世刚、孔凡礼等,并没有留意到作者晚出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。他们对《耆旧续闻》作者的考察,大致有两条途径,一为结合笔记内容追踪作者“陈鹄”;二为探索书名“耆旧续闻”。以

^①萧良幹等修、张元忬等纂:《[万历]绍兴府志》卷六《山川志》三,影印明万历十五年刊本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五二〇号,成文出版社,1974年,第538页。

下分别述之,并结合笔者所见,加以深入探讨。

1. 结合笔记内容追踪作者“陈鹄”

二十世纪以来,对《耆旧续闻》有所关注的学者屈指可数,按时间先后,以钟克豪、郑世刚、孔凡礼为代表。

在钟克豪《宋代小说考证》中,曾对《耆旧续闻》有所考证,并专撰一节考其作者事迹,名之曰“撰人考”。他基本上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出发,并结合《耆旧续闻》的具体内容,略考撰人事迹:

《耆旧续闻》撰人,《四库提要》云:“此书世有两本,一本题曰‘南阳陈鹄录正’,似乎旧有此书,鹄特缮写校勘之;一本题曰‘陈鹄西塘撰’,则又为鹄所自作,疑不能明。然诸书援引,并称陈鹄《耆旧续闻》,或题鹄撰者近之欤?鹄始末无考。”按此书之名《耆旧续闻》者,谓闻之与耆旧,故一本所称录正,或非钞录之意,乃撰录之谓也。书中载陆游、辛弃疾诸人遗事,又自记尝知辰州,与陆子逸游,则开禧以后人也。考书中第七卷云:“余淳熙甲辰,识曾于(宁)[临]安郡庠。”第六卷云:“余乙亥岁为滁教”,以其时核之,则宁宗嘉定八年也。是鹄为孝庙时人,而仕于宁宗朝,其踪迹略可仿佛矣。然书中采录诸家论说,例注所引书于条下,辗转传钞,多所脱漏,则此二条为鹄自述,或为他人之文,盖不可识别矣。^①

他的考证,与四库馆臣的思路是一致的:从笔记内容上去探寻,但是最后依然不敢肯定这些内容是否为作者自述。后来的郑世刚点校本前言、孔凡礼点校本前言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去考证作者事迹,不过最后几乎还是停留在四库馆臣所云“始末无考”这四个字上。郑世刚点校本前言云:“由于本书中的条目遽难断定是陈鹄自述或是转抄他人的文字,上述考证亦只能略备参考而已。”^②孔凡礼点校本前言云:“关于陈鹄生平,到现在为止,除本书以外,还有什么发现。”^③可见他们共有的无可奈何的心情。

他们的探讨虽然无甚发现,但却说明了两个事实:第一、结合笔记内容考察作者,殊难实现。第二、若想在宋代史料中发现陈鹄的生平事迹,几乎不可能。以资料详实著称的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》为例,其在“陈鹄”条下,仅用了《全宋词》的材料:

陈鹄:字西塘,南阳人。所著《耆旧续闻》,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后名人言行,掇拾颇多。

《全宋词》4/2322^④

①钟克豪:《宋代小说考证》,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1987年,第133页。

②郑世刚校点: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2页。

③孔凡礼点校: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,中华书局,2002年,第271页。

④昌彼得、王德毅、程元敏、侯俊德编: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》(增订再版),鼎文书局印行,1986年,第2523页。

而《全宋词》的记载却是：“鹄号西塘，南阳人。”^①两书对“西塘”理解不一。李国玲编纂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》没有对“陈鹄”进行补充。可见，若要在现存宋代史料中寻得一个叫“陈鹄”的人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
2. 探索书名“耆旧续闻”

关于书名，学者亦有所探讨。钟克豪云：“是书之名，称《耆旧续闻》，玩‘续闻’二字，似先有正集而佚之，惜已无考。”^②孔凡礼在点校前言中说：“本书以《耆旧续闻》名书。说‘耆旧’，通俗一点，是指有丰富阅历、熟悉掌故、学问渊博、值得尊敬的前辈。说‘续’，当指此书之前，还有一本书，可惜现在见不到了。”^③两先生都认为，在“续”之前，可能还有一本书，可惜是书已难以查考。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。

宋代笔记时有续作，常以“续”、“后”、“补”、“馀”等命名，以“续”为名的比较常见。如有自续：文莹《湘山野录》《续录》、魏泰《东轩笔录》《续录》、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《续笔谈》、彭乘《墨客挥犀》《续墨客挥犀》、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《续钞》、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《续笔》、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《续笔记》、谢采伯《密斋笔记》《续记》等；也有他续，如：王铨《续清夜录》（沈括《清夜录》）等^④。续写笔记的命名比较单一，常在书名中增“续”字或书名之中改一字为“续”。以此推之，《耆旧续闻》之前当有一书名为“耆旧×闻”。那么，宋代是否有这样一本名叫“耆旧×闻”的书呢？

在南宋李俊甫所编的《莆阳比事》中，多次引用《耆旧纪闻》一书。从书名来看，颇似《续闻》之正集。李俊甫，福建莆田人，嘉定十年（1217）进士。其编《莆阳比事》“上考史记，旁摭记录，下至诸家文集、行实、碑碣、书尺，悉从采掇。询于耆儒，恭之故老，积十馀年，心目之勤，厘为七卷，几数万言”^⑤，可见其认真严谨态度。根据书前林瑒序，可知此书完成的时间当在嘉定甲戌（1214）年之前，并于该年刊刻。所以，《耆旧纪闻》一书当早于此年成书，也就一定早于《耆旧续闻》。阮元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称赞《莆阳比事》“属辞有法，纪事核真，可与《汝南先贤传》、《襄阳耆旧（志）[传]》并传”^⑥。程光裕在《〈莆阳比事〉之史料价值》一文中，称：“俊甫纂辑时采录之书，今多散失，赖《莆阳比事》而保存者至多，弥足珍贵，亦富史料价值也。”^⑦此言大致不差。但是必须注

①唐圭璋编：《全宋词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2322页。

②《宋代小说考证》，第134页。

③孔凡礼点校：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，第274页。

④陈振孙撰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：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341页。

⑤陈说：《莆阳比事》序，李俊甫纂辑：《莆阳比事》卷首，阮元辑《宛委别藏》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50册。

⑥同上。

⑦程光裕：《〈莆阳比事〉之史料价值》，宋史研究室编：《宋史研究集》第七辑，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，1974年，第558页。

意到,此书中材料已非原始材料之貌。所谓“比事”,即将性质相同的事类放置一处进行比较。所以《莆阳比事》一般将两件事置于一条目下,并取对偶的小题,如“闽分八郡,莆有三邑”之类。这种“比事”,也就相当于林兆珂在《刻〈莆阳比事〉录叙》所说的“缙分璧合”^①,人为加工的痕迹很重。因此,李俊甫所做的是将原材料消化并重新撰写的工作。他常常将所见到的材料综合取舍,以叙事为主,采纳诸家评论之精华,凝练浓缩,再以己语道出。

《莆阳比事》共提及《耆旧纪闻》五次,分别为《耆旧记闻》两次、《耆旧纪闻》三次,但皆未提及作者之名,只得从内容的角度去探讨其与《续闻》的关系。

笔者通过对这五条材料的阅读分析,可知《莆阳比事》所取材料均与莆田人物及士履科第相关,并结合多种材料重新书写,虽不能反映《耆旧纪闻》之原貌,但能窥其一斑。《耆旧纪闻》多载里人俗语,无论是引用文人诗,还是记录世人歌,都带有身为莆人的自豪感。这些文字内容及语气与《耆旧续闻》很不相符。《耆旧续闻》中多谈名人轶事、诗词掌故、四六文章等,未见有载莆田人物、士履科第、里人俗语之类。虽然在成书时间、书名类似的角度来看,两书颇为类似,但两者内容、风格偏差太大,不大可能为前后相继之书。

前辈学者所开辟的两条途径,没能解决《耆旧续闻》的诸多问题。即使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向前,依然收获无多。寻找作者、探索书名之路似乎已经走到尽头,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继续前行?当然有。剔去作者、书名外,还有一些为人所忽视、为人所误解,却又为人所常用的材料,如“西塘”、“南阳”、“录正”、“集”、“陈鹄”等,这些字词伴随着《耆旧续闻》流传于明清两代,他们的意义何在?若联系到作者后出这一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来考察,在山穷水复之后,能否柳暗花明?

二、明代陈鹄考

在宋代史料中未发现有关陈鹄的记载,但是在明代,却有陈鹄其人。

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明代钞本《石田翁客座新闻》,在其署名处写有“西塘陈鹄录正”六字。联系到上文所提到的《耆旧续闻》不同版本的署名,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,为方便起见,将他们列于下:

《石田翁客座新闻》	西塘陈鹄录正
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	南阳陈鹄录正
	陈鹄西塘撰

《客座新闻》的署名与《耆旧续闻》署名非常相似。其中“西塘陈鹄录正”与“南阳陈鹄录正”除了可能表示籍贯或自号的前两字不同以外,后四字完全相同。那么,“录正”《客座新闻》的“陈鹄”和“录正”《耆旧续闻》的“陈鹄”

^①林兆珂:《刻〈莆阳比事〉录叙》,《莆阳比事》卷首。

是同一人吗?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需要简单介绍一下《客座新闻》。

《客座新闻》的作者为沈周(1427-1509),字启南,号石田,晚又号白石翁,苏州府长洲人,著名画家,被誉为明四家之首。除大量画作以外,还著有《石田先生集》、《石田稿》、《石田先生诗钞》、《客座新闻》等。《客座新闻》为其汇集整理明初社会之街谈巷语、奇人异事、名士逸闻等而成的一部笔记小说,在其去世时即已成书。文徵明《沈先生行状》云:“先生所著诗文曰《石田稿》,总若干卷。他杂著曰《石田文抄》、《石田咏史补忘录》、《客座新闻》、《续千金方》,总若干卷。”^①可知,沈周去世时,好友文徵明即已知晓此书。关于《客座新闻》的成书过程,清代梁维枢《玉剑尊闻》卷三云:“沈周晚岁名益盛,客益众,造百客堂,每近暮,必张筵四方人,各令述所闻,书于简,曰《客座新闻》。”^②其概况大抵如此。关于书名,不仅文徵明、梁维枢称为《客座新闻》,明清两代的书目记载以及他书转引、丛书收录,皆称为“客座新闻”或“客坐新闻”,未见有称“石田翁客座新闻”者。沈周末以石田翁为号,后人尊称之为“石田翁”。由此可知,《客座新闻》经后人传抄而增“石田翁”冠于首。这个源头即为“陈鹄录正”之本。

“陈鹄录正”本,是现存最早的《客座新闻》的钞本。考上海图书馆藏七卷本《客座新闻》卷六“夏德乾御史高洁”条有“正德十年八月十八日”之具体时间^③,可作为时间上限,故陈鹄录正时间当在正德十年(1515)之后。卷首钤有明代郑晓“淡泉”、“大司寇章”等藏书印。郑晓字室甫,号淡泉,明浙江海盐县人,卒于嘉靖四十五年(1566)。则陈鹄录正《客座新闻》的时间当在郑晓下世之前。由此可知,陈鹄录正《客座新闻》的时间应在1515-1566年之间。在这个时间段之前,最先著录《耆旧续闻》的《文渊阁书目》并没有提及作者^④,在这个时间段之后,著录《耆旧续闻》的《[万历]绍兴府志》才开始注明作者陈鹄。如果《耆旧续闻》也是“陈鹄录正”于这个时间段的话,不仅恰好填补两书记载之间的空白,还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两书记载发生的变化,为后来书目的著录找到文献的依据。那么,《客座新闻》中的“陈鹄”是《耆旧续闻》中的“陈鹄”吗?

从两书的性质、内容、流传来看,《客座新闻》与《耆旧续闻》有几点相同之处。首先,两书都是笔记小说,篇幅不长,内容纷杂;其次,两书皆无序跋;再

①文徵明著,陆晓东点校:《甫田集》卷二五,西泠印社出版社,2012年,第351页。

②梁维枢:《玉剑尊闻》卷三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166页。

③这条材料记载明显晚于沈周的卒年(正德四年),当出于后人所补。汤志波据此认为,《客座新闻》是经过讲述者、记录者(作者)、传抄者三者加工,共同完成的(汤志波:《〈客座新闻〉成书考论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,2013年第2期,第118页)。

④关于《耆旧续闻》的书目著录与流传,可参看许勇:《〈耆旧续闻〉流传考——以书名、作者及流传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澳门文献信息学刊》2015年第1期,第23页。

次,两书在明代流传甚稀,无单行刻本,钞本亦罕见;最后,两书均流传于江浙一带。这些共同点皆属外证,两书署名的共同点才是内证。

1. “录正”考

目前,还无法直接从“西塘”与“南阳”寻得彼此的联系,但是从“录正”两字能够得到一些共通之处。

鲍廷博曾猜测“录正”为陈鹄的字,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。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卷一“刊刻之名义”条中提到“录正”二字:“坊塾刻本,有曰校正,有曰录正,有曰印行。皆刊刻前后之职,亦因事立名,各有所本。”^①陈鹄所录正之书,未见有刊刻者,应该是私人抄书。他的工作性质应该与“校正”相当,都是“因事立名”。

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五经部五著录明刊本《京本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云:

此二十五卷本,乃吕氏全书。黄俞邵谓世所传本皆删节,惟正德刊本独全,其注与句解本同。惟《左传》标题下无“主意”。后有墨图记云“汝水文峰胡岳英录正”。^②

此处“汝水文峰胡岳英录正”之“录正”和“陈鹄录正”之“录正”意义应是一致的,都是“因事立名”。叶德辉所说“坊塾刻本,有曰校正,有曰录正,有曰印行”是针对牌记而言,宋元明刊本牌记中,“校正”与“印行”字样较多,而“录正”却极为罕见,除上面所举一例外,笔者还未见到其他的例子。

更为罕见的是,“录正”两字出现在署名栏中。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、《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》中附录有《撰校刊刻人名索引》,“内容包括本书所收录之善本书的著者、编者、校者及出版者之姓名”^③,基本上反映了善本书署名内容及牌记内容的情况;未见有一例“录正”。《提要》收书达四千多种,《补编》收书达七百多种,王氏所见可谓洋洋大观矣,尚不及一例“录正”,而今笔者所见《客座新闻》、《耆旧续闻》均在署名处出现“陈鹄录正”,怎能以巧合对待?“录正”与“陈鹄”的两次同时出现,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。

除了罕见以外,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来:“胡岳英录正”本《左氏博议》作者是吕祖谦,而不是胡岳英;“陈鹄录正”本《客座新闻》作者是沈周,而不是陈鹄。这说明,“录正”与“撰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“录正”应是指抄录、正误之意。

既然“录正”非“撰”,那么,《耆旧续闻》的两种不同的署名“南阳陈鹄录正”、“陈鹄西塘撰”孰是孰非?

①叶德辉著,李庆西标校:《书林清话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29页。

②瞿镛编纂,瞿果行标点,瞿凤起覆校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141页。

③王重民:《中国善本书提要·编辑说明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2页。

我们知道,抄录者(或刊刻者)时有以己意私改原书的通病,著录者也常常非照实详细著录。下面以宋代笔记《朝野类要》的流传与著录为例,讨论署名方式的变化。

《朝野类要》是南宋赵升编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笔记。关于其署名,也有两种。一云“赵升集录”,一云“赵升撰”。这与《耆旧续闻》的署名方式有很大的可比性。

署名为“赵升集录”的有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、上海图书馆藏明刊本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惠栋校四库底本。署名为“赵升撰”的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武英殿聚珍本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。明代版本皆作“集录”,《四库》所用底本抄自明本,亦为“集录”。然而,在《四库》本中却改为“撰”,《提要》亦云“宋赵升撰”,不提“集录”二字。四库馆臣的改动,影响甚大,使得武英殿本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皆沿其说^①。

在书目著录中,除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^②、《平津馆鉴藏记书籍》^③记载“赵升集录”之外,其他皆不提“集录”二字。《澹生堂藏书目》云:“《朝野类要》五卷,一册,赵升。”^④《万卷堂书目》云:“《朝野类要》五卷,赵升。”^⑤《天一阁书目》云:“《朝野类要》一卷,刊本,宋端平丙申文昌赵升向辰著并序。”^⑥在他书转引中,或仅注书名,或如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所引,皆径称“赵升《朝野类要》”^⑦。

从此可以看出,在书籍的流传过程中,署名栏中的人名尤为关键,而人名之后所提到的工作性质常常被人忽略,即使在书目记载与他书引用中,也常缺而不录。由于在书籍中人名与书名之间云“撰”的情况最多,后人常常以为那些阙而不录的“工作性质”皆为“撰”,观念一旦形成,原本所题的工作性质就不被理解,渐成弱势,在流传过程中,被强大的“撰”所替代。反之则不然,以“集录”替代“撰”既无实例,也不合情理。

与此同理,《耆旧续闻》中的“录正”与“撰”也是如此,“录正”在先,“撰”后出。唯一与《朝野类要》不同的是,《耆旧续闻》并没有一个署名的明钞本(或刻本)流传下来,以致缺乏文献上的依据。“录正”先出,且与“撰”性质不同,那么陈鹄就不是《耆旧续闻》的作者,而仅仅是一个抄录者,并做过正

①赵升编,王瑞来点校:《朝野类要》插图、点校前言及附录《朝野类要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07年。

②丁丙: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十八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619页。

③孙星衍:《平津馆鉴藏记书籍》卷三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97页。

④祁承燾: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卷四,冯惠民、李万健编: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4年,第971页。

⑤朱睦㮮:《万卷堂书目》卷二,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,第1073页。

⑥范邦甸等:《天一阁书目》卷三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265页。

⑦王士禛:《池北偶谈》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50、75、81页。

误之类的工作。从“录正”来看,录正《客座新闻》与《耆旧续闻》的“陈鹄”当为同一人。由此带来的问题是:“西塘”与“南阳”又该如何解释?

2.“西塘”、“南阳”释疑

在释疑之前,必须谈一谈陈鹄对《客座新闻》书名及署名上所作的改动。上文已提到,“石田翁”三字为后人所加,最早见于陈鹄录正本。陈鹄加“石田翁”三字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此书的作者是石田翁沈周。除此以外,陈鹄还删去原有署名(不排除原来无署名的情况^①),并在署名栏中添“西塘陈鹄录正”六字,以突出显示自己所做的工作。从“西塘陈鹄”来看,“西塘”不可能为字,与籍贯或自号相近。

推及《耆旧续闻》而言,陈鹄大致也对书名及署名作了修改。首先,将书名改为“西塘集耆旧续闻”;其次,在署名栏增“南阳陈鹄录正”六字。“集”,鲍廷博从陈鹄为作者的角度猜测云:“曰‘西塘集’,殆其别集之一耶?抑西塘为所居,而是书辑录于此地耶?”^②他认为,集可能为“别集”或“辑录”之意。李裕民在《四库提要订误》中,曾对鲍氏的说法提出怀疑,并认为:“‘集’当作动词,作‘辑’解,而非别集之集,西塘当为陈鹄之号。”^③此说颇有道理。上文已认定陈鹄为抄录者而非作者,所以《耆旧续闻》也就不可能为莫须有的“《西塘集》”中的一种。因此,“集”当作动词用,辑录或收集之意。“西塘集”即为西塘所辑录或西塘所收集,可见“西塘”并非籍贯,而是陈鹄自号。冠以“西塘集”,而并没有如《石田翁客座新闻》一般,以原作者冠于前,也可推测,陈鹄所见《耆旧续闻》之本当无署名。换句话说,正是因为其无署名,抄录者陈鹄才敢以自号冠于首。

“南阳”该做何解?因为“西塘”与“南阳”皆可为地名,所以他书中时有称鹄为西塘人或南阳人之语,不可偏信。古人以西塘、南阳为号者多矣,并不见得都是西塘、南阳人。西塘,可以为水塘之西或西边有水塘;南阳,可以为洲之南岸或名字叫“阳”的地方的南边^④。这在理解上就有很大的灵活性。在署名中,“南阳”与“西塘”处在同一位置,意义应相同。在字面上,“南阳”与“西塘”亦颇有相对之义。所以,笔者认为,南阳也可能为陈鹄之号。至于为何陈鹄在此自号“南阳”,也颇易推测。书名中已添“西塘”,为避免重复,所以署名中

①关于陈鹄所见《客座新闻》有无沈周署名已不甚知晓。上海图书馆所藏明钞本《沈氏客谭》一书署名栏中题云:“长洲沈周启南”。《沈氏客谭》被认为是《客座新闻》的稿钞本,以此推断,《客座新闻》当是有署名的。沈周的另一部著作《石田稿》,现存稿本,并未署名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3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271页)。

②孔凡礼点校: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,第401-402页。

③李裕民:《四库提要订误》(增订本)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338页。

④如明代金子兆,休宁洲阳人,所居在洲阳之南,故号南阳(金瑶:《金粟斋先生文集》卷七《族侄孙陝西苑马寺监正金君传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42册,第591页)。

就不题“西塘陈鹄录正”，而改称“南阳陈鹄录正”。那么，在明代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既号“西塘”，又号“南阳”的陈鹄呢？

3. 明代进士陈鹄

在陈鹄录正《客座新闻》的时期（1515-1566），浙江确实有一个名叫陈鹄的人。

多洛肯《明代浙江进士研究》附录《明代浙江进士名录与小传》记载，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戊戌科第三甲：“陈鹄：贯浙江绍兴卫，官籍，直隶武进县人，国子生，治《诗经》，字鸣霄，行二，年30，浙江乡试43名，会试62名。”^①不过，此书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其文献来源。陈文新主编《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》一书中，明确据《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》抄录有关陈鹄的生平：

陈鹄，贯浙江绍兴卫，官籍，直隶武进县人，国子生，治《诗经》。字鸣霄，行二，年三十，十二月初九日生。曾祖杰，百户。祖绎，百户。父瑞，百户。母李氏，封安人。重庆下。兄鹤，百户。弟鸣、凤、鹄。娶吴氏，继娶朱氏。浙江乡试第四十三名，会试第六十二名。^②

“官籍”、“国子生”、“百户”，都说明进士陈鹄生长于官宦人家。他生于1509年，户籍为浙江绍兴，祖籍为直隶武进，是明代浙江书画名家陈鹤之弟。陈鹤，字鸣野，号海樵山人，著有《海樵先生全集》二十一卷，今仅存卷一至卷十八。卷十五《补寿文峰季叔六十序》一文，陈鹤记录了陈氏家族的发展史：

鹤先世以三尺起毗陵，蒙世禄，镇会稽以来，凡九世于兹矣。前子姓尚落落，惟吾祖生吾父及叔氏五人，吾父生鹤及弟者四，而叔氏之生各有弟，弟兄所出若瓖，而族因以蕃然。^③

可以知道，陈氏先祖由毗陵（武进）迁会稽，世袭百户。百户为明代的世袭军职，从时间上推断，陈氏先祖可能为明代开国功臣，并以此授百户之职。陈鹤以长子身份袭百户，诸弟只能以考取功名为出路。陈鹄排行第二，理应首当其冲。陈鹤在《送二弟鸣霄会试序》中说：“吾弟鸣霄志于学，三年专焉，咏于《诗》而能言，游于百子而能迁，赤手擅文而辞斐然。”^④可见陈鹄非平庸之辈。据《[万历]绍兴府志》记载，陈鹄曾做过都司断事，并官至僉事。都司断事，都指挥使司断事司断事的简称，掌理卫所刑狱，正六品。僉事，即都指挥僉事，正三品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对进士陈鹄知之甚少。虽然陈鹤有文集流传下来，但是涉及其弟陈鹄的也就前文所提到的《送二弟鸣霄会试序》、《补寿文峰季叔六十序》两篇短文。陈鹄的号，史籍未载。

①多洛肯：《明代浙江进士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303页。

②陈文新主编：《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952页。

③陈鹤：《海樵先生全集》卷十五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86册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107-108页。

④陈鹤：《海樵先生全集》卷十五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86册，第112-113页。

三、小结:陈鹄不是作者

本文从作者晚出这一值得怀疑的现象出发,结合明钞本《石田翁客座新闻》中的署名,通过对“录正”的分析与考证,认为:陈鹄是明代人,不是《耆旧续闻》的作者,而仅仅是抄录者。除了录正《耆旧续闻》外,他还录正了沈周的《客座新闻》。“西塘”是陈鹄的号,“南阳”也有可能为号。《耆旧续闻》的署名“陈鹄西塘撰”为后人误改。

在此基础上,结合明代史料,找到浙江绍兴籍的进士陈鹄,其生活年代与所处地域与录正者陈鹄颇为相似,唯其号,未见史籍记载。进士陈鹄是否为录正者陈鹄,难以确认,不敢妄下雌黄,暂且聊备参考。

【作者简介】许勇,男,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·作者更正·

本人在《文献》2015年第5期发表《孔尚任朱批〈平叛记〉钞稿本述略》一文,将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藏《平叛记》钞本认定为孔尚任朱批钞稿本。最近看到莱州市图书馆所藏张谦宜批注的《平叛记》原刻本,经比对,知前者实为后者的钞本;而钞本末毛贡题跋中脱落的关键字,在张谦宜批注的《平叛记》原刻本中作“稚松”,即指张谦宜(字稚松)。故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所藏《平叛记》并非“孔尚任朱批《平叛记》钞稿本”,当为张谦宜批注《平叛记》原刻本的钞本。特此更正,并向《文献》编辑及读者深表歉意。

王晓兵

2016-03-29